

苏联剧变纪实

中央党校科研部

内部参考资料

苏联剧变纪实

柯 燕 编

编者说明

最近，苏联政界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剧变。为了客观、全面、系统地了解剧变发生的原因，深入研究剧变的性质、经验教训及其影响，我们把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能够收集到的材料，按照：一、剧变成因；二、“8·19”政变经过；三、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四、剧变风云人物简介等四个问题，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编选综合成册，用以回顾和展示剧变发生的全过程。

为方便阅读，在“剧变成因”里，我们加了部分事件提要，仅供读者参考；限于篇幅，此间发布的有关法令、党纲、条约等重要文献，未能全文照发，读者若有需要，请参考中央党校科研部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第二册）及新华社编《参考资料》的有关部分。

由于时间仓促且水平有限，挂一漏万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1年10月

目 录

| | |
|--------------------|---------|
| 一、剧变成因 | (3) |
| (一) 联盟问题 | (8) |
| 1、旨在维护联盟统一的新联盟条约 | (8) |
| 2、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 | (19) |
| (二) 经济及社会危机 | (22) |
| 1、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 | (22) |
| 2、混乱的意识形态 | (34) |
| 3、动荡的苏联社会 | (41) |
| (三) 中央政权、苏共、军队、克格勃 | (47) |
| 1、中央政权 | (47) |
| 2、苏共 | (49) |
| 3、军队 | (56) |
| 4、克格勃 | (58) |
| (四) 甚嚣尘上的反对势力 | (59) |
| (五) 戈尔巴乔夫 | (65) |
| (六) 以援促变的西方对苏政策 | (68) |
| 二、“8.19”政变经过 | (74) |
| 三、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 (123) |
| (一) 苏联国内的反响 | (123) |
| (二) 东欧六国的反响 | (141) |
| (三) 西方世界的反响 | (146) |
| (四) 其它国家的反响 | (162) |
| 四 剧变风云人物简介 | (171) |
| (一) 叶利钦 | (171) |
| (二) 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八名成员 | (172) |

苏联剧变纪实

中央党校科研部

责任编辑：祖 之

工本费：5.00元

一、剧变成因

今年8月19日苏联发生的闪电式政变，不仅使世界各国领导人一时茫不知所措，而且也使东西方许多苏联问题专家和研究机构顿感震惊和迷惑。这说明，人们对于苏联还知之甚少，各项研究还惊人地肤浅和落后。人们最不能理解的，恐怕要数发动政变、起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竟是戈氏逐个精选的、一大批被公认的戈氏“忠实战友”和“左膀右臂”了。他们既有长期跟随戈、为戈效力的国防部长和克格勃主席，也有走马上任不过半年有余的“新星”。政变起后，戈氏曾责斥他们是“野心家”、“冒险家”、“阴谋家”。政变失败后，政变发动者甚至被攻击为“笨蛋”、“一脸教唆犯相的人”。使用这样一些简单的人身攻击，并不能解释政变的来龙去脉。

8·19政变其实有其必然性，是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结果。它的突然爆发，不合常规逻辑的演变及最终结局，刚好说明矛盾激化的特殊性和新的特点。

有人说，8·19政变的失败标志着苏联社会演化的新旧阶段，甚至是新旧历史时期的分野。失败的后果确实是严重的，这已有大量事实为证。但是，我们仍然不应过分夸大它的意义，因为主宰新阶段、新时期的矛盾依然如旧，导致8·19政变的社会冲突和动因也依然如旧，而且在短时期内还看不到解决的“曙光”。8·19政变只是说明，在暴露矛盾、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方法上变了。

导致政变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可以列举出以下五点。

1，陷入绝境而又无法自拔的统一联盟。

如果我们注意到政变爆发仅比8月20日提前一天，即比原定9个共和国开始草签“革新的联盟条约”提前一天，如果我们注意到政变当天卢基扬诺夫发表的对“9+1”联盟条约的抗议声明，我们就不难发现联盟危机与政变的因果关系了。

现阶段的联盟危机肇始于1990年春取消宪法第6条、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那之前，联盟问题基本上局限于有特殊历史原因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而且远不如后来尖锐。但是政治多元化的闸门一开，始料不及的两大问题便突然冒了出来，并且迅速上升为左右全局的头号政治难题。这就是中央同地方（主要是共和国）的权力分配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领头羊是叶利钦。是他率先搞了个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这个宣言是一把双头戟：一头指向统一的联盟国家，另一头指向其他的民族共和国。它指向联盟国家，是因为它以大法的形式宣布，俄罗斯在自己境内拥有完整的主权，联盟法律须经俄罗斯议会批准方能在境内生效。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联盟作为统一国家的基础，一年多来纠缠不休的“法律大战”便由此而来。

叶利钦等人为什么要这么搞？他们有两重目的，一是凭借俄罗斯在领土、人口、

资源方面的优势向中央夺权，搞垮叶派视为头号障碍的全苏统一的共产党、军队和克格勃；另一层目的是保护俄罗斯的利益不受其他共和国侵犯。前一点是公开的，毫不掩饰的，后一点是隐蔽的，迷惑性极大，特别是对俄罗斯境内的民众而言。叶派甚至鼓动其他共和国一道向中央夺权，因而也就更便于掩盖俄主权宣言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实质。

苏联的民族问题极其复杂，源远流长，几百年来推行的一直是赤裸裸的大俄罗斯主义和俄罗斯化，少数民族的正当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占总人口一半的各少数民族一向对俄罗斯族怀有敌意，积怨难消，时而有骚乱发生。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长期的单一制国家制度，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间，已使各民族结成了难以分割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因此苏联的民族问题只能在合理的政策范围内加以调整，而不能采取民族离心主义的对抗。自从倡导公开性、民主化以来，少数民族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公发出抱怨，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叶派人物对此不能容忍，88年以前见诸俄罗斯报刊书籍的言论，多有指斥少数民族愚昧落后，拖了俄罗斯后腿等内容，更有攻击少数民族得寸进尺，趁改革之机大捞俄罗斯油水，等等。俄罗斯主权宣言的发表，实际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报复行为，是企图在新形势下继续统治少数民族的表现。

去年秋天，叶派趁倒雷日科夫政府之机提出，俄罗斯在中央政府中要拥有总理、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三个职位，以代表俄罗斯的利益。此后，叶甩开戈尔巴乔夫，独自发起四大国（俄、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条约，更是明搞联盟中央、暗占民族老大哥地位的证明。这些企图受挫后，今年3月，俄罗斯在叶主持下就联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他趁机塞进“俄罗斯要否普选总统？”，可以说是被他抓住了火候，因为当时已有几个共和国都有了自己的总统。今年6月，叶登上俄总统宝座之后，立即干预联盟外交、国防大政，不出一月又颁布了“非党化”命令，矛头已不仅指向苏共，而且意在瓦解联盟的支柱——中央政权、军队和克格勃。在这种背景下，右翼势力和大俄罗斯主义飞速膨胀。少数民族当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对大民族主义的回敬，它们早已不满足于发表主权宣言，而是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之后，纷纷宣布独立。——这就是一年来苏联各共和国玩弄主权宣言和宣布独立的根本原因。

今年7月，戈尔巴乔夫搞成并向苏共中央全会亮出的“9+1”联条约盟草案，其实是戈氏向各类民族主义大踏步退让的产物。这种让步妥协按卢基扬诺夫的看法，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从苏联国名中取消了“社会主义”，代之以“主权”（共和国）字样；（2）不再规定联盟拥有统一的经济区域（指在全苏境内），不再拥有独立的银行体系和必要的财产、资源，特别是联盟丧失了直接的税收进项；（3）共和国实际上有权中止联盟的任何法律；（4）联盟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因而也将形同虚设，毫无权威保障。这种突然的转折，显然意味着苏联将要“国不将国”。

出乎预料的是，苏共七月全会异常沉闷地听取了戈的报告。平静压抑着忿懣，同时也预示着将要发生某种意外。

这种意外的事，就是8·19政变。

2、急剧恶化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70多年来，苏联人一直引以自豪的是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习以为常的是物价超级稳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尽管这种提高既缓慢又很少同外界比较。但是到了80年代初，这一切似乎都与苏联人无缘了。戈氏上台后，人们曾怀着极高的热情欢迎他的改革倡议。1985—1987年确也小有起色，但不久即因政治动荡重又陷入经济危机。6年来，苏联人经历了期望——失望——绝望的痛苦过程，传统的价值观念悉遭破坏之后，更使他们惶惑、冷漠、不知所措。“我究竟是谁？我能指靠什么？”（摘自《消息报》），典型地勾划了他们的心态。难怪有人在报刊上抱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仅用了8年多，卫国战争仅用了4年，战后恢复仅用了5年，可改革已经用了6年却一切似乎还没有开始！

6年来，除了一次次的美妙许诺之外，人们没有得到什么实惠。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首次出现负增长（有的学者估计实降11%），1991年上半年官方统计比去年同时期再下降10%，学者估计第3季度下降17—20%。去年通胀率为15%，今年可能要达到3—4倍！去年产净粮2.2亿吨，人均700余公斤，可是没有西方的紧急援助，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竟然没有越冬食品。

苏联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复杂、深刻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两种改革路线之争一直没有解决。一种基本上是以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帕夫洛夫等人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西方和苏国内一部分人又称他们为保守派、反改革派、右派、官僚派、等等）。他们一贯主张改革应该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主张不要对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一概否定，要稳定政局，加强秩序和纪律，他们并不否定市场，但主张可调控的市场经济，强调改革要逐步进行。另一种则对历史和现实全盘否定，主张以西方政治经济为楷模，一切推倒从头来。这一派就是以叶利钦、波波夫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民主反对派（西方和他们自己称之为左派），但戈尔巴乔夫在今年的明斯克演讲中曾明确地称他们为反共右派。这确实是名符其实。值得一提的还有，今年以来，戈尔巴乔夫曾倡导过一种中派理论或中派主义，鼓吹走一条既不同于“反改革派”，也不同于反共右派的中间道路。这种理论貌似公允，实则含糊，但一时赢得过不少拥护者。时过不久，到了苏共七月全会前夕，事实即已证明，中间派是有的，中间路线却不存在。在紧要关头，中间派是要迅速分化的，要么站在社会主义选择一边，要么站到反共右派一边去。

不应该把8·19政变看作是保守派或反改革派同改革派之争，而应当看作是两种改革路线的斗争，只不过形势的发展迫使这种斗争采取了一种新方式。

3、处在绝路上的中央政权、苏共、军队和克格勃。

去年，雷日科夫在苏联议会里曾激忿地描述过中央政权的处境，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象苏联部长会议这样整天在挨骂声中工作的。戈氏的无原则平衡术和妥协退让政策以及反对派的从中作梗，使得中央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只能或胎死腹中，或半途而废，到头来还得承担一个骂名。

今年新组建的内阁处境仍然毫无改善。新总理帕夫洛夫上台时原是要大干一番，有些作为的，例如，他顶住国内外压力废除大面额卢布、在同罢工者谈判中坚持原则、实

行销售税、改革财政和物价，但他很快发现，在得不到总统和共和国有力支持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只能使局势更糟。他向苏联最高苏维埃要求授予内阁总理补充权限一事，说明新内阁与总统的矛盾飞速地表面化了。

苏共的处境就更为尴尬了。名义上，苏共仍是苏联执政党，但身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重大决策上均绕过苏共中央，使得执政党领导徒有其名。叶利钦今年7月的非党化命令，对整个苏共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苏共最高领导本应予以坚决反击，但戈氏回答全党要求的仅仅是发出了几句有气无力的暧昧的“表态”。他竟然宁肯牺牲苏共，而不冒与叶派搞坏关系的风险！

非党化命令不仅指向苏共，更重要的是指向政权机构、军队和克格勃。军队和克格勃不仅被指责为国家资源的最大吞噬者、反改革和政变阴谋的总根源、苏共和现政权的保护伞及后台，而且被诬为要对一切动乱实际负责，如立陶宛电视大楼事件、红场戒严，等等。军方在国际国内的声望直线下降，社会上不仅反军言论泛滥，而且苏军的生活水平和处境也日益恶化，几十万撤回国内的官兵无人关照，住无住处，连家属就业、上学问题都难以解决。

8·19政变于是成了上述种种忿懑不平的发泄口。

4、戈尔巴乔夫与其称之反共右派之间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时常会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指责和抨击。但这并不说明他在两派之间保持严格中立。正如反对派说过的那样，他在行动上只不过是比反对派迟缓半年（或半步）而已。他反对过政治多元化，反对过多党制、总统制，反对过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反对过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也反对过放弃苏共总书记职位和非党化，更反对过瓜分联盟财产和军队，但是到头来他都能一一满足反共右派的要求。他不怕反对派的攻击，也不怕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彼得拉科夫、巴卡京等人一一离他而去，因为下一步他们还是会重新站在一起的。

但是他的摇摆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决定摇摆幅度的发条，是要看他能否最大限度地保持住他优越的政治地位。反过来，这又是造成他近年来威望直线下降的重要原因。

28大闭幕以后，叶派加紧了夺权行动，以致在去年12月演出了一幕逼宫闹剧。叶在全国电视台上要求戈氏下台，彻底改组中央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戈氏一面向苏共和军方作出友善表示，一面毫不留情地向叶派发动反击。他在明斯克声色俱厉地怒斥叶利钦、波波夫是反共右派，是反改革的反动势力，同时加紧组建戈自己的具有浓厚反叶派色彩的内阁。今年3月，就在俄罗斯非常人代会开幕的同时，戈亲自全程参加苏军党代表会议并发表了强硬讲话。

但是在俄罗斯人代会之后，他似乎意识到了俄罗斯总统非叶利钦莫属这一严酷现实，于是火速转变立场。他先是向叶派暗送秋波，促使巴卡京出台竞选，以破坏俄共推举的候选人雷日科夫进入第二轮选举的可能，在叶果然当了总统之后，他向叶派送了一份更重的礼物——在联盟条约问题上完全倒向了叶。到了这时，再企望戈氏起而反对叶的非党化命令，已是恍若蜃楼了。

去冬至今，戈氏演说词中常常提及要防范、反击“反改革、破坏改革的反动势力”。在去冬今春，这是指叶派，即“反共右派”，而今年4月以后则又指的是反叶的左派了。

戈氏的这种反复无常、“五车换位”式的立场变换，无疑是造成这次众叛亲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怎样看右翼反对派？从组织上说，他们微不足道，完全不能同拥有1500万党员的苏共相比。在群众性组织方面，他们也非常分散。但是，他们比起左翼，拥有五方面的明显优势：（1）有一个以叶利钦为首的严密的组织核心，这个核心不仅是一切反对派势力的精神领袖，而且握有俄罗斯实权，进可以影响苏联全局，退可以固守苏联的心脏地带；（2）在象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样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里拥有广泛的影响，形成坚厚的保护层；（3）他们虽没有掌握中央政权、军队和克格勃，但是几年的苦心经营已使他们深深渗透到了各个部门，不仅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巴卡京、彼得拉科夫等人遥相呼应，而且在军队和克格勃里也有“自己人”；（4）他们随时可以利用民众对改革危机的不满和绝望，向当权的政敌施压；（5）与左翼不同，右翼只要行动就能得到西方的支持。

到8·19政变前，左翼势力，特别是苏共早已陷入半瘫痪状态。苏共的瘫痪与垮台有着自己的特点：自上而下。在地方基层，即使在今天，苏共也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影响，但是上层却早已开始了四分五裂、无力战斗的过程。这只要看看今日苏联的各派政要人物就清楚了。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派，早先他们都曾是苏共的上层核心人物或智囊人物。纷争、混乱，都是由苏共上层演变而来的。

5、咄咄逼人的西方对苏政策。

6年来，苏联的西方政策发生了两次重要位移。1990年以前，苏联主要考虑的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减轻防务负担，创造有利于改革的国际环境。这是它大力推行“外交新思维”的阶段。自从1990年出现联盟危机和经济大滑坡以后，苏联的外交努力明显地转向争取国际经济援助——从短期的临时紧急无偿（或有偿）援助到长期的、马歇尔计划式的改革援助。

且不说西方是否真有能力实行第二次马歇尔计划，单说西方援助只是在苏联的鼻子前面晃来晃去，就已可知西方援助一直可望而不可及的原因了。西方的政策很明确：多说少做，用紧急援助拴住苏的两腿，同时，以“半步之差”的大量援助的诱饵，导引苏联，迫使苏联全面就范。今年以来，戈尔巴乔夫在欧安会上的演说、挤进七国首脑会议、访日访南韩的表现、同布什及其他西方政要的急切会晤，无不说明苏联已经降为乞讨国。苏联反复强调，如西方不肯慷慨援助，苏联难保不出大乱子，核武器将失控，西方将处于危险之中。苏联还明确要求把援苏与海湾战争等同起来，即要求拿出与海湾战争费用相等的款额援苏。苏联还频繁派出各类代表团到西方游说。但这一切都不能给苏联外交增加筹码。

与此同时，西方却大大提高了援助要价。首先，苏联在国际问题上必须给予密切配合；其次，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西方式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第三，苏联必须保证核武

器不失控，为此必须主动积极地——销毁并满足西方的核查要求。

苏联国际地位的沦落和西方咄咄逼人之势，必然激起国内强烈的不满。今年以来，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发表过措词强硬的抗议。

但是西方已经有了自己的特洛伊木马。这就是叶派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左右两派的对立相应升级，也是毫不足怪的事。

8·19政变已经过去近三个月了。研究与政变有关的各种资料信息，使我们对苏联局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单就政变本身，我们认为有以下4点特别值得指出：（1）政变起因于苏联社会各类已无法用和平方式解决的深刻矛盾；（2）组织粗陋，仓促上阵。这次政变无纲领、无计划，严格地说也无组织。和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政变相比，它简陋得超出一般常识之外——竟然连一支哪怕是小小的、肯于誓死效命的武装都没有；（3）矛盾百出，首尾不一。政变领导人早晨还宣布戈氏改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晚间却又信誓旦旦地宣称要继续奉行戈氏改革并望戈重新出任总统；（4）后果严重且一时难以消除。政变的失败导致了苏联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甚至是中央的权力真空。

还有一点至今仍使人们感到纳闷，政变领导人不会不清楚他们的行动是与现行宪法相背的，可他们竟然“天真幼稚”到用宪法来规范自己的政变行为！亚纳耶夫的第一号公告就宣布，他们是根据宪法第127条行事的。查了一下，第127条规定，如总统因事或因病不能履行职责时，可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但全部问题却在于，总统根本没有病！

我们只能说，政变领导人也患了某种“戈氏病”，——而从对政变领导人的处理看，倒是叶派从来不讲什么心慈手软的。

政变的迅速告终，由此看来应在意料之中。但我们还想重复强调一次，苏联仍然处于变化之中，各种矛盾仍在发展，8·19事变及其失败不是过程的结束，大概，没有人敢打保票说，不会再发生第2次、第3次类似的政变。

（一）联盟问题

1、旨在维护联盟统一的新联盟条约

据新华社综述：苏联有100多个民族，15个加盟共和国，38个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区。民族矛盾历来错综复杂。尤其是1990年以来，随着各加盟共和国权力机构选举结束，分立趋势迅速在全苏蔓延，致使苏联处于解体的边缘。为了维护联盟的统一，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特别是在6月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上，戈尔巴乔夫多次提出了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新构想，正式提出了缔结新联盟条约的问题。

新联盟条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3部分：（1）基本原则：苏联是由平等的各共和

国自愿联合组成并在条约赋予它的权力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的主权联盟国家。各共和国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全部权利。(2) 联盟体制规定：各共和国——签约国可以直接加入联盟，也可以作为其他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加入，这不会使它们的权利受限。(3) 联盟机关规定：联盟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将在各共和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组成。

新联盟条约的签订，尽管其用意就是为了维护联盟的统一，然而终是覆水难收，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立趋势愈演愈烈。

1990年

6月19日 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党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说：“应当排除俄罗斯与苏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与苏共的任何形式的对立。我们的全部设想和行动都应当符合历史现实，都应当斟酌再三。我们在使用‘俄罗斯’这个词时，应当永远记住同样令人憧憬的一个词——‘联盟’。”“党不再掌握国家的职能。国家本身实际上也正在实行政权力分配。选举已成为真正自由和人民的选举。我们实际上正处于目前政治多元化的临界点。”“我想，我们需要赋予中央这样一种权力，即当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所做出的决定与苏共章程相抵触时，中央有权废除该决定。还应该保证中央有权直接下到普通党员当中，下到基层党组织中去，以及举行全党投票和展开党内辩论，而不问某一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这方面所持立场如何。这将保持和促进共产党的统一和平等”。

11月17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第四次人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我提议代表大会审议在全国举行全民投票的建议，以便使每个公民都可以对以联邦制为基础的主权共和国联盟表示“赞成”或“反对”。每个共和国的全民投票结果就是最终裁决。至于脱离苏联这一举动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来进行，同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过程的各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最近我们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共和国和其他民族区域实体在宣布改变自己法律地位的同时，无视苏联现行宪法。不客气地说，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态度有引起严重的无秩序，乃至一场混乱的危险。这是一条死胡同。我们大家都已经感觉到这一点。因此我认为，人民代表大会需要坚决声明：今后在签订最终确定所有条约参加者的法律地位的联盟条约之前，苏联宪法仍是必须无条件执行的最高立法文件。总统将据此行使权力。

11月1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继续开会。会议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一个紧急改组和加强国家政权结构的8点建议。

这8点建议包括：赋予联邦委员会新的权力，使其从协商机构转为协调中央和共和国行动的有效能的机构，成立跨共和国委员会作为联邦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撤销总统委员会，成立属于总统管辖的安全委员会，同时立即根本改组执行机构。进行人员调整，设立副总统职务，保证地方执行机构的有效工作等。

11月23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回答了《国际文传电讯》特派记者维亚切斯拉夫·捷列霍的问题：

问：如果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总统关于改组国家管理机构的建议，你还会是政府首脑吗？还是只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

答：如果总统的建议被批准，那么部长会议，相应的还有作为它的领导人的我将会自动辞职。至于我今后的政治生活命运，连我自己都没想过。

12月10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的题为《为革新我们的联盟国家而斗争》的讲话中说：国内没有什么比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煽动民族纠纷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了。

国内围绕共和国权力和联盟权力关系问题展开了辩论和政治斗争。划分权力的过程已失去控制，具有公开争权的性质，受害最大的是一系列经济部门。权力划分的争论背后有一重要政治问题：联盟将是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松散实体。

戈在谈到许多人提出联盟条约草案为何更改国名问题时强调，这丝毫不意味着改变社会主义的原则方针，草案中仍保留“苏联”称谓，但这是国家文件，是考虑到一些共和国决定改变自己名称的结果，所以就提出改变联盟名称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的结论。

12月1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国家银行法。自公布之时起生效的这个法律文件为根本改革国家的银行系统，以使其适应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的需要创造了法律基础。根据这项新法律，将建立两级银行系统——中央银行为第一级，其它各种统称“商业银行”的信贷机构为第二级。

12月27日 苏《消息报》刊登苏第四次人代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的法律。其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苏联总统的建议，成立和撤销各部及苏联其他中央国家管理机关；

根据苏联总统的提名，批准任命总理，在会议中同意或者不接受苏联内阁成员候选人和苏联安全会议成员，同意解除上述人员的职务；用“苏联内阁”字样代替“苏联部长会议”字样；

苏联副总统根据苏联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与总统同时选出。苏联副总统受苏联总统委托履行总统的部分权限并在总统不在和总统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代理苏联总统。

苏联内阁是苏联的执行和发布命令的机关并隶属于苏联总统。

苏联内阁由总理、副总理和苏联各部部长组成。

苏联内阁结构根据苏联总统提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确定。

各共和国政府首脑可以参加苏联内阁工作，拥有表决权。

12月29日 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全民投票法。其中规定：如列入投票名单的公民有半数以上参加投票，其中有半数以上表示赞成，则认为提出供全民投票的决定已通过。

1991年

1月1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上，围绕国名是否保留问题争论激烈。

1月1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局势发表声明。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立陶宛领导人极力推卸责任，妄图把事件的罪责转嫁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及转嫁到共产党员头上。”声明号召“真正的爱国者要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秩序，在共和国领土上恢复苏联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做到严格执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稳定国家局势的各项决定。”

1月24日 苏联《论据与事实》周刊第4期刊登B·阿尔克斯尼斯上校的谈话，题为《莫斯科抛弃了我们》。谈话说：莫斯科抛弃了我们。总统背叛了我们，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苏联政府背叛了我们，鲍·叶利钦背叛了我们。

1月31日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伊万·波洛兹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言时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改革已进行不下去了。

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1月14日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兴冲冲地宣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四个共和国的主席或总统，决定签订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四方条约”，可能于2月在明斯克签，别的共和国以及中央以后也可以参加这一条约。

这一图谋一旦得逞，苏联总统将被架空，中央政府将形同虚设，联盟条约也将失去意义，因为这4个共和国加起来，在面积、人口和工农业产值上分别占全苏的92%，79%和85%。

2月20日 苏联总理向议会提出内阁法草案。帕夫洛夫在向国家议会提出内阁法草案时强调指出：苏联内阁取代了原苏联部长会议，是在总统领导下的新的执行机构，它应当有权颁布“国家整个境内的所有机构、组织、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必须执行的决定。

3月8日 苏联公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草案）（简称新联盟条约）。

3月9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批评了新的联盟条约草案的一系列条款，指责联盟中央企图在政治方面削弱俄罗斯议会领导人。他强调指出，1991年对于俄罗斯民主运动的命运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一运动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来取得胜利。

3月26日 苏3月17日举行的关于联盟命运的全民投票最终结果表明76.4%的投票人赞成保留联盟。

3月26日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回答了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总经理克拉夫琴科和政治观察家费苏年科提出的问题，说那些赞同保留联盟的共和国将签订联盟条约，有的地方在4、5月间就可以提出条约供签署。而留在联盟以外的那些共和国在经历一定时期后将开始在另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基础上形成同联盟的关系。对这些共和国来说，国内联系的一切优越性也就消失了。戈重申除了把改革进行到底外，他本人没有其他目的。戈认为，关于苏联目前在倒退的说法是误解，倒退是不行的。

8月30日 伊萨科夫、扎哈罗夫在俄罗斯非常人代会上作针锋相对的副报告。伊萨

科夫说，叶利钦在走向新的独裁，回到现实主义道路的一切可能性都已消失。并说联盟领导人采取不少错误步骤，戈应考虑让位了。

扎哈罗夫的副持告表示支持叶利钦报告的所有主要观点。

4月1日 开了四天连一项议程还没有结束的俄罗斯非常人代会，今天虽然依旧争吵不停，但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四项议程中的大半。总统制问题将在下次人代会再议，使急于让叶利钦当总统的“民主派”大失所望。塔斯社说会上发言表明赞成和反对叶利钦的人数近于相等。

4月1日 绝大多数格鲁吉亚选民主张恢复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独立。

4月1日 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上午在市苏维埃大楼白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苏联首都最近的政治形势。波波夫说：我们最近遇到最严重的问题便是3月28日的游行和集会事件。看看“3·28”事件的本质。中央政府以部分俄罗斯人民代表（29名）的请求为名、派出大批军警名曰保护他们，实际上是禁止人民群众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4月5日 俄罗斯联邦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争论激烈，每天都吸引着大量苏联和外国记者。大会原定从3月28日开到4月2日，结果延长了三天，直到4月5日结束。

激进派和传统派在俄罗斯发展应走什么道路和制订什么样战略的问题上依然分歧重重，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在当前苏联的条件下又是何等不易。俄罗斯不能孤立行事，它上面还有联盟，横向还有其他共和国。因此，俄罗斯议会本身的斗争仍将是复杂和激烈的，它的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4月10日 格鲁吉亚议会主席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就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昨天宣布格鲁吉亚国家独立一事写信给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信中的主要思想是格鲁吉亚并没有与苏联断绝全部关系。这已经是苏联第5个宣布自己独立的共和国。

4月12日 塔斯社报道：近日来，外高加索复杂的社会政治局势，因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决定从4月10日起停止从邻近铁路接受客货列车而急剧尖锐化。这造成列车在驶近共和国的途中受阻，甚至取消了开往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客运列车。

从截止到4月12日的情况看，受阻列车有60列，运载食品，其中包括易腐食品，粮食、石油产品、煤炭、药品、工业原料等货物的车皮达3000多节。其主要部分的交付期已满。

4月15日 《国际文传电讯》发表题为《伊瓦什科谈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的文章。苏共中央总书记伊瓦什科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特派记者特列霍夫采访时说，中央书记处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建议审议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摆脱经济危机途径问题，另一个是党员在苏维埃工作问题。

4月15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会见中发表讲话，表示在本月份签订联盟条约，并呼吁叶利钦同中央进行建设性合作与协作。

4月18日 苏制定莫斯科地位法草案，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在协商基础上对莫斯科实

行共管。

4月20日 苏联内阁开会讨论反危机方案，认为将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力量结合起来是可以接受的。

4月21日 各加盟共和国第一次议会间代表会议开幕。与会者提出了举行由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参加的“圆桌会议”的议程草案。议程草案的制定者主张在苏联成立“人民信任的过渡政府”，将权力“由联盟结构移交给各共和国的新设置的机构”。

提交大会讨论的不仅仅是举行“圆桌会议”问题，还将讨论并批准跨议会代表会议章程。章程草案中宣布，会议的主要宗旨是“建立主权的民主国家”。

4月21日 保守的“联盟派”代表决心谋求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并于下个月召开特别国会以迫使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

4月22日 苏加盟共和国议会间代表会议闭幕，与会者呼吁一旦苏实行紧急状态全民应开展不服从运动。

4月24日 路透社说联合声明的发表说明戈叶关系出现突破。

4月23日 苏联最大共和国的总理、俄罗斯主席鲍里斯·叶利钦的盟友西拉耶夫谴责了克里姆林宫新通过的反危机纲领。他称巩固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是苏摆脱危机唯一办法。

4月24日 俄罗斯议会通过“总统选举法”。

4月24日 《真理报》刊登苏联总统与9个共和国领导人《关于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刻不容缓措施的联合声明》。声明说：我们社会的危机继续加深。社会被社会冲突和族际冲突搞得动荡不安。生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受到威胁。国家的法制和纪律遭到严重的破坏。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极尖锐的问题、过渡时期的严重困难、改革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的已经汇集在一起。

4月29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否认他同9个共和国领导人签订过向共和国的要求作出重大让步的秘密协议。

5月1日 俄罗斯联邦各地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活动。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克麦罗沃举行的五一群众集会上发表了讲话，签署了关于把库兹巴斯煤炭企业由全联盟管辖改为由俄罗斯管辖的决定。

列宁格勒工会联合会发起的群众游行和抗议集会在皇宫广场举行。游行集会的参加者表示坚决反对无节制的涨价，反对失业、反对缺乏社会保障，反对生活水平下降。反对派运动也组织了游行。

伏尔加格勒工会在五一呼吁书中呼吁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争取社会保护，在五一节这一天各工会没有把人们组织成一支支队伍。早上在烈士广场上有几千人举行了游行集会。讲演者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稳定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势。

晚些时候，约200名“民主俄罗斯”的拥护者聚集在这个广场上打出这个组织在集会时常用的口号“打倒苏共、打倒苏联总统、政府和最高苏维埃”。讲演者在表示支持叶利钦的同时批评他签署了“九个共和国声明”。